



抗战研究丛书



平民声音

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

林发钦 江 淳 主编

救國軍歌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抗战研究丛书

PINGMIN SHENGYIN

AOMEN YU

KANGRI ZHANZHENG

KOUSHU LISHI

平民声音

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

林发钦 江 淳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民声音：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 / 林发钦，江淳主编.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8

(抗战研究丛书)

ISBN 978-7-5548-0843-6

I. ①平… II. ①林… ②江…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澳门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0015号

责任编辑：林玉洁 叶曙明 李木子 李 鹏

责任技编：姚健燕

封面设计：陈国梁

平民声音：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

PINGMIN SHENGYIN: AOMEN YU KANGRI ZHANZHENG KOU SHU LISHI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7印张 340 000字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843-6

定价：90.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邮箱：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15809



策 划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抗战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向玉

编 委

林发钦 江 淳 王 熹 温学权

研 究 助 理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瑞冰	区嘉卉	方娜杉	刘绮琪	刘嘉骏
关恒基	严子健	吴文诺	吴泳杰	吴洋洋
宋婉婷	陈可儿	陈嘉燕	欧 钊	钟国伟
郭家宜	黄佩玲	黄宝仪	黄淑凝	萧咏琪
雷佩莹	戴嘉茵			



《抗战研究丛书》总序

澳门理工学院院长 李向玉

澳门理工学院是澳门首家通过国际高等教育权威学术评鉴机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国际认可的公立高等学府。学院以“普专兼擅，中西融通”为校训，秉承“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院方针，坚持“扎根澳门，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争创一流”的治校理念，创立“教学标准国际化、科研工作规范化、校园设施电子化、行政工作法治化”的治校模式，始终贯彻多学科与应用型为主的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和完善教研系统，以服务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为努力方向。学院下设的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管理科学高等学校、体育暨运动高等学校、艺术高等学校和高等卫生学校等六个教学单位，是培养社会所需应用学科和行业技术实用性人才的重要基地。而因应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所设的博彩教学暨研究中心、理工·贝尔英语中心、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和中西文化研究所，则主要开展相关短期培训和专项研究工作，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研究和及时的服务。其中中西文化研究所是体现澳门理工学院“小而美、小而精”特色、坚持“教研并重”，专门从事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及相关文化推广工作的学术单位，在澳门内外具一定



学术声誉和影响力。

2001年成立的中西文化研究所，虽然时间不长，但凭借澳门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和人文传统优势，专门开展中西历史与文化交流研究。配合学院教研需要，研究所不仅承担了学院部分通识课程的授课任务，而且将中西文化交流史、澳门历史与社会、口述历史、文化遗产及中国地方志确定为五大研究方向，并通过教学、专题研究、口述历史、史料整理、出版书刊、学术会议、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致力于澳门历史文化的整理、普及与推广工作，积极主动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提供学术咨询。2015年，中西文化研究所经过调整充实，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方面立足澳门本土，围绕澳门历史与社会问题，发挥研究所人员的专业优势，展开深入研究，逐渐建立自身“澳门本土”的研究特色；另一方面，坚守大学使命和社会责任，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努力为澳门发展文化创意事业、实现产业多元化和建设旅游休闲中心服务，既开阔了研究视野和领域，突出了研究所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强化了研究的功能与作用，又赋予研究所新的生机和活力，使路子越走越宽，前景美好，大有发展前途。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相继举办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澳门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处在“孤岛”的恶劣环境，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要关头，澳门全体同胞决然挺身而出，投入波澜壮阔的抗战救亡运动中。很多澳门优秀儿女投身祖国的抗战洪流，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澳门社会，各界同胞以满腔爱国热忱，秉承人道主义精神，冲破重重限制与封锁包围，以认购抗战救国公

债、捐输抗战急需物资、募捐现金、组建抗战宣讲团、创办抗战刊物、赈济战争难民等方式，开展抗战救亡的活动与宣传。澳门人为支持祖国抗战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谱写了澳门抗战救亡的壮丽篇章。

然而由于史料不足和客观条件限制，在澳门史研究中，有关澳门抗战救亡史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诸多历史真相湮没无闻，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利于对澳门历史发展的全面认识和研究，也不利于爱国爱澳的教育与宣传。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整理和出版抗战时期的澳门历史资料，保存先辈抗战的光辉事迹，弘扬澳门人爱国爱澳的光荣传统，中西文化研究所在2014年起开展“澳门与抗日战争”系列学术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史料整理、口述访谈、图像分析、专题研究、学术会议和主题展览等，特别关注学术界过往忽略的口述访谈和影像，构成相对完整的学术研究体系，注意不同形式史料的互证，全面推进澳门抗日战争的研究。

本人40年来一直从事葡萄牙语和澳门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01年倡导创立中西文化研究所，并一度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深谙本所的研究优势与特色，也深知本所承担的研究工作对于澳门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意义。现在喜见“澳门与抗日战争”系列学术研究陆续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汇编成《抗战研究丛书》，成熟一种，出版一种。根据研究规划，本丛书以“抗战”为主题，内容以“澳门与抗战”为主，但又不限于澳门，分册包括：档案汇编、报刊资料选辑、口述历史、历史图志、专题史论等，形式多样，内容厚实。透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澳门在70多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中，绝不是置身于祖国灾难与抗争之外的世外桃源，而是始终跟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澳门人在祖国南陲边土，尽自己最



大能力、一切可能地守卫着祖国，为她流血牺牲、为她奉献人力财力、为她庇护陷入绝境的难民。特殊的历史背景，使澳门真实经历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壮，留下了不一样的战争记忆。澳门自身的社会赈济和支持祖国抗战的爱国活动，涌现了一个个感人的澳门抗战故事，谱写了中国人不一样的抗战历史，在中国抗战史中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和历史意义。

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谨以本丛书纪念在抗日战争中惨烈牺牲的千千万万抗战英烈和无辜平民，中华民族将铭记那段山河破碎、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面向未来，追求永远的和平。

是为序。

李向玉

2015年7月28日于澳门理工学院汇智楼



口述历史视野下 抗战时期的澳门社会

——兼论澳门口述历史的价值与出路

林发钦

一、平民的声音

传统历史研究以文字史料，即文献和档案为主要证据，忽略对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的应用。口述历史是研究现代史和社会史的一种重要方法，澳门与抗日战争的研究长期以来偏重在葡萄牙的“中立”政策、国共两党在澳门的活动、澳门支持祖国抗战和民间社团赈难救济等重大问题上，对抗战时期澳门社会生活的研究较为单薄。这是因为除了报章外，传统的档案和文献，缺乏对百姓日常生活生活的描述，而报章又是大宗的文献史料，如不连续阅读抗战八年的多份报章，只看一时一报，也难以准确地从海量的报道中提炼总结出抗战时期澳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口述历史正可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和文献本身不具备的功能，提供新的史料形式——口述史料，也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口述访谈。事实上，口述历史近年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方法，对抗战时期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更是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可喜的是，在澳门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日渐受到重视，并已有机构和个人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同的努力和尝试。在抗战口述历史研究方面，就先后出版过《抗战时期



的澳门》^①和《口述历史——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②两书。前者是“抗战时期的澳门”专题展览的成果，访问了一批上层社会人士，虽然没有转录逐字稿，严格意义上算不上是一本专门的口述历史专著，但由于出版时间相对较早，且开展了口述访问，所以有关项目应被视为澳门口述历史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后者直接以口述历史为书名，内容和字数虽然不多，但却是本地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澳门与抗战口述历史专书。^③这些成果为抗战时期澳门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从2014年起开展大规模的“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研究，试图透过一定数量受访者的口述历史，重构抗战时期的澳门社会状况。研究最终成功深度访谈了50位经历过抗战时期的澳门人，他们大多数是平民百姓，有的在澳门土生土长、有的抗战时期避难澳门、有的在战后移居澳门，受访时以“澳门人”的身份和经历，忆述烽火岁月的艰苦生活。每位受访者的具体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个故事都充满“个性”；但所有故事，却又离不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社会“共性”。他们都亲历战争，其深刻印象和负面影响延续至今，伴随一生；他们的回忆在档案文献以外，提供了另一个全新的视野——平民的声音，直接反映了战争对人民的影响，控诉了战争的残酷和日本军国主义对被侵略国家的摧残。本文尝试透过对50位战争幸存者访谈记录的分

-
- ① 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澳门：澳门博物馆，2001年。
- ② 蔡珮玲主编：《口述历史——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澳门：澳门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同学会，2005年。
- ③ 有关澳门口述历史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的澳门》和《口述历史——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两书应用口述历史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林发钦：《口述史料与澳门历史研究》，载《澳门日报》2005年3月27日D7版；林发钦：《澳门口述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程祥徽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回顾与前瞻——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07年，第241~247页。

析和总结，质性描述抗战时期的澳门社会生活图像。

二、经济、战火与社会生活

（一）避难澳门

由于葡萄牙奉行所谓中立政策，抗战时期日本并没有占领澳门，因此使澳门成为各国难民（尤其是内地难民）的避居之地。1938年及1941年，广州和香港相继沦陷，大量难民涌入澳门。陈既平说：“1938年，即抗战开始之后，执信中学搬来澳门，于是我和爸爸两个就跟着一起来了。爸爸是执信中学的教师，所以要来，我是学生，也都要来澳门。”事实上，澳门成为当时广东部分学校迁徙的目的地，因此有大量师生涌进。然而，来澳的路途千辛万苦且充满危险，傅日光回忆：“我们的经历很辛苦……当时陆路不好走，要从水路到澳门，那个教员带上我们，在江门海皮^①一起坐艇，经过小榄、石岐、前山，绕到澳门。走那段水路是很惨的，一有飞机经过，就要立即回岸边，泊在一些蔗田里，我们会伏下，因为怕有机枪，他们见到有船就会扫射下来。”九十高龄的傅日光说起这些死里逃生的童年经历，依然记忆犹新，一切恍如昨天。刘羨冰忆述：“在日军开始空袭中山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人把窗门全都粘上纸，不透出光来，飞机来到的时候就叫我们躲到桌底下……我记得逃难来澳门之前，曾经两次逃到中山附近的穷乡僻壤，害怕日本人入城的时候跟他们硬碰硬。”处处无家处处家，逃难成为今天澳门老人共同的童年记忆，他们之所以还能够活着，就是因为逃难成功。

（二）饥荒

香港沦陷后，难民激增，周边地区都被占领，使澳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航路受阻，粮食供不应求，澳门的自然环境又欠缺耕地，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饥饿成为那个年代澳门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刘羨冰的爸爸是秘鲁华侨，有外汇接济，生活相对安稳，但她也回

① “海皮”，即海边。



忆：“我们也是要吃杂粮的，要吃些发胀了的米饭，让你吃了半碗就觉得饱。这些一会儿使人又觉得饿的饭，我们叫它作‘神仙饭’。我最记得我们有时又饥饿，又没有什么东西好吃，到收到爸爸汇来的钱时，妈妈就让我们开心一下，给我们一毫子去美国楼餐厅买一个餐包吃，大概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吃餐包。”如果家庭环境不怎么好，生活就更艰难了。林福棣回忆：“当时家中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只有一种葛薯开了花结了果，没有其他东西吃，没有办法了，就把葛薯的籽炒来吃，吃到我差不多要死了。隔壁邻居看到我这样，就说，‘快去找一把米，炒香它，浸在水里，给他喝’，喝两次，就救回了我。”罗佩芳说：

“在日本仔来的时候，是吃不饱的。我们已经算比较好了，还可以把番薯、芋头掺到米饭中吃。有些人真的非常饥饿，食粟米^①、番薯^②、芋头，有人甚至连这些东西都没有。”各种粮食供应不足，尤其是米荒，政府实行配给制，使富裕阶层也不容易买到粮食。陈既平说：“到后来贵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得卖了，有钱都买不到。”极度饥饿之下，许多平民百姓要从粪便中找寻未消化的食物残渣进食，以保存性命。谭明东说：“我对粟米有很深的印象。当时市面上有很多乞丐，不少人就在街角住宿、煮食。一次，我在街上看到有人煮食，他们是在煮一粒粒的粟米。那些粟米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有些人身体差，吃了硬粟米不能消化，便将一粒粒粟米拉屎排出来。那些饥民在极其饥饿的情况下，在屎中把粒粒粟米拣出来洗净再煲，以作充饥。”陈桂勤也有相近的记忆：“那时候在澳门，从石墙街到白鸽巢的路上，很多人随便在路旁排便，先前进食的玉米粒没有消化直接排出，大雨过后，只剩下玉米，街上就有人把玉米捡起，然后进食。在日本仔来的时候，这是没有办法的。”林显富曾亲身目睹饥民捡粪便残渣吃，成为他最深刻的战争记忆：“当时有人吃了喂马的粟米，拉出来没有消化的玉米屎，这都有人会抢，抢了洗干净再来吃。有些人说这未免太夸张了吧，但这是真

① “粟米”，即玉米。

② “番薯”，即地瓜。

的！这是我小时候见过印象最深刻的事。当时我在同善堂读书，学校煮粟米派给一些人，我在同善堂，即是现在炉石塘那附近走过，旁边有一些横巷，有一些人拿了吃完以后，因为很难消化，便拉出来一粒粒的粟米，但是拉出来之后便接着有人去抢，抢了洗干净后再煮来吃。我真的亲眼看到。”总之，饥饿或半饱半饥是抗战时期澳门社会生活的常态。冼为铿说：“家里因为兄弟姐妹多而没有饭吃，只有地瓜、芋头、‘神仙糕’吃。什么是‘神仙糕’呢？就是用硼砂‘发’^①大那些米，然后蒸成一个米糕，表面上好像很大，但是吃不饱的。而且每顿饭我的继祖母是要用秤的，每人几两几两，计口授量，不是任你吃的。我们一般都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

（三）轮米

粮食紧缺，澳葡政府实行大米分配制度，并禁止囤积粮食。“轮米”，即排队轮候米粮是抗战时期澳门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陈既平说：“我们家也是要轮米的。1941年香港刚刚沦陷时，在望厦那边有一个大操场，就在那儿轮米，晚晚半夜就要去的了，拿着一张凳子，坐到天光就可以轮了。”傅日光回忆：“没有粮食，就只有几两米，那时有个粮食证的，调查每家每户有多少人，然后发粮食证，就去望厦那边轮米。当时望厦、观音堂、高士德大马路都是很荒僻的，只有几两米要给一家人食。买一个咸干面包也要去中国面包铺排队，要排长队轮面包，一个人可以买一个咸干包，即现在的猪仔包。有些人懂得说两句葡文，可以直接进去买，也不需要排队，那时就是这样刻薄。我记得中国面包铺是在水坑尾的，排队排到现在的葡国领事馆，排到斜路那儿，非常远。”非常时期，社会秩序得不到保障，轮米人踩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谭明东回忆：“我当时是七八岁，有一次也和姐姐半夜去排队买粮票。由于澳葡处理不好，没有适当安排，轮米的人又不守秩序，秩序太乱，人人都想争先买到粮票，冲入去，造成人踩死人。以后家里就不让我们去轮米了。”冼为铿忆述

① “发”，即使用硼砂把米胀大。



道：“抗战时期，我有时还去轮米，地点好像是现在观音堂的附近，即望厦那里。轮米时，他派到给你，你才有，但是我两次都轮不到，轮到前面就已经派完了。派的米是用较低的价钱卖的，那时候澳门的米好像卖到四五百元一担，在当时是很贵的。因为那时候币值很低。租屋只是十几元一个月，你可以想想五百元的米价是多么厉害。租金便宜，米却贵。”“米站消息”是抗战时期澳门报章的重要内容，反映“轮米”是民众重要的日常生活，这些报道与战争幸存者的回忆是一致的。

（四）饿殍遍野

粮食供应长期不足，饥荒爆发，导致大量居民和难民饿死。高峰时期，政府要出动收尸队处理尸体，并在氹仔北部开挖“万人坑”埋葬大量遗体，成为抗战时期澳门最悲惨的社会境况。刘羨冰回忆得非常详细：“街头上的一些惨剧我也知道，因为大人看了报纸会说。我未必看到报纸，但我都会知道，例如鹅眉街有人吃人；有报道说有一个人未断气便有人割了他大腿的一块肉；有一个妈妈喝用死掉的婴儿来煲的汤（不知是谁拿来煲汤给她喝，说是用来保养的）……这些人间惨剧差不多每天都听到。所以我说自己思想上早熟，是因为我作为七八岁的儿童就听到这些人间惨剧。讲起‘万人坑’就是澳葡政府每天出黑箱车，在街上执捡死尸，甚至有一些是还没断气的，但他们都要捡。听说因为工作人员认为‘反正一会儿都要回头再捡一次，倒不如现在就捡了他，不然今天的工作就做不完了’。澳葡政府会把死尸载去氹仔的‘万人坑’，那就是现在澳门大学图书馆下来的地方。它之所以叫做‘万人坑’，是因为埋葬了不止一万个死尸，人人都是这样叫的。那里倒了全部死尸，是乱葬岗来的。埋去‘万人坑’的人绝大多数是饿死的。当时的物资非常非常缺乏。因为澳门原本是十二万人口，但走进来的就有三十万人，香港沦陷后，再涌入一些学校、学生。有些人来到澳门后已没有人接济，便饿死了。如果我们不到广西去，我们也会饿死。”饥荒使得部分难民离开澳门，愿意冒着炮火的危险回到战区寻找一方可以温饱的土地，因为饥荒的残酷程度

不比战火小。罗佩芳回忆：“当时周围很多人都饿死了。经常见到街上的人瘦骨嶙峋，虽然瘦小，但脚却是肿胀的，非常难看。我年纪虽然小，但都记得。”黄就顺说：

“用垃圾车收集了死尸以后，便运到氹仔靠近现时澳门大学下面的海滩，那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没有棺材和其他东西，就将死尸扔下去。那里叫做‘万人坑’，也不知道葬了多少人，挖一个大坑填下去，十尺八尺的沙滩，埋了就罢了。那时候没有桥，就找木船载到那里。氹仔的人口很少。”绝境中的难民逃过了战火的威胁，原以为在澳门找到了一方和平之地，却想不到有人最终却死于因战争而引致的饥饿。

（五）抢食

为求生存，香港沦陷后的“风潮”时期抢食之风甚烈，许多叙述者都有相近的记忆。罗佩芳说：“如果你上街，手上有饼之类食物，你千万不要在街上吃，那些人已经饿得连自尊都没有了，没有东西吃，他们就一手把你的食物抢过去，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为了活命，他们没有东西吃，只有抢。”在战争灾难面前，人性和尊严有时会很脆弱。陈既平回忆：“当时在街上抢东西的特别多，一些可以食的东西都会被人抢走的，我也有被人抢过。被抢都没办法，他一抢走你的面包，首先就咬一口，这样即使你要回也没用了，就干脆让他走了。”刘羨冰说：“长楼有很多巷子能转上大三巴街，我亲眼看到一个饥饿到不得了的人抢了别人的面包塞进口里，使劲地吃，那人打他、揍他，他就随便你打，打头也好，打身也好，打哪里都好，他也不理，一直到吃完面包为止。”黄就顺说了一个故事：“我姐夫在港务局工作，他们政府人员每个月发薪水是有米的。他住在三盏灯，办公的地方在妈阁庙上面，他要用人力车，由妈阁庙将那袋米载回三盏灯。走到工人体育馆，即现在工联总会时，饥民就走出来用刀一划^①，米就倾泻到地上，饥民一拥而上来抢米，但这有什么办法？又不可以打他们！那些米就被抢光了。”区天

① “划”，即用刀在米袋上划一个口子。



香有切身的感受：“抢食物的事是最常见的。最惨的是我婶婶经历过的一件事，旧时有油炸粽，是糯米加碱水弄成的，粘些面粉来炸，那些就叫做油炸粽，一来可以充饥，二来也挺好吃的。那时我婶婶就买了一个拿在手上吃，有一个小朋友走过，一手抢我婶婶的粽就塞进嘴里吃，那个粽很热很热，他就在那里跳，烫到他嘴都肿起来了，都烂了。我婶婶说，你不要这样，你吃吧，你吃吧，看到心都酸了。街上经常有抢东西的，你在街上拿东西要拿得好好的，否则他一手就会过来抢。有时都不是大人抢的，大多数是一些十岁左右的小朋友来抢，你也不舍得打他，又不舍得骂他，就唯有作罢。”这些平民社会生活细节是重要的史料和证据，显示战争的罪行应不止于直接的杀戮。

（六）侨汇不通

抗战时期很多华人壮丁出国谋生，把钱寄回家养妻活儿。但在日军占领区，侨汇往往受阻。香港被占领后，居住在澳门并依靠海外亲人寄钱回来接济生活的平民，经济来源很不稳定。刘羨冰一家就因为侨汇不通而决定暂时离开澳门：“香港沦陷后，澳门的环境更差，而且我的爸爸能否再寄钱接济我们成为未知数。我们的接济方式是我爸爸把钱寄到香港，我的姨丈在大东酒店做总管，他实际上是中转人，把秘鲁一大批华侨的钱中转出去，他通过很多方式分别把钱汇给我们，现在香港也沦陷了，那么还能接济我们吗？”战争的影响无远弗届，战火蔓延还一度使刘羨冰一家中断了与父亲的通信联络，失去最大的生活依靠。陈既平说：“我读书的那间学校，原来在广州是属于较好的贵族学校，里面的学生很多都是华侨，他们就可怜了，因为华侨汇款不通，我们自己同学就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米这样子。”

（七）验粪

抗战时期的澳门人如要离澳到日占地区，必须验粪。“验粪”成为抗战时期澳门最不堪回忆的耻辱之一。李虹对此有详细的记忆：“在澳门的人要回到内地，日本仔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他们说怕传染大肠杆菌和其他细

菌，要验粪。任何人出入境都要验……我明天要出去了，必须先来验粪。要有验粪纸，才给你进入。你这张验粪纸只是几天有效的。每个人脱下裤子，撅起屁股就验。到底当时日本人有没有真的化验？天晓得，就是帮你插进去，哪有空帮你验？他们都不当中国人是人命，帮你弄一个手续而已，验粪才能回去。但其实是日军派人来验的，执行这任务的都是中国人。”许多老人回忆起验粪这事儿，受屈受辱的感觉仍然挥之不去。黄文添说：“在抗战时期的澳门，如果要去内地，就要去验粪，日本人拿着一个东西向你的肛门捅下去，这就叫验粪。有验粪所，地点在卢九花园那边。日本仔要求中国人必须那样验，要拿了验粪纸才可以去内地。插入肛门这样验，你说，这不是污辱我们中国人吗？”成年人要验，儿童也不能幸免。刘羨冰也说：“准备逃难，先要走出关闸。我印象深刻的是，出关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拿一条竹枝去‘撩’些粪给他们检验，很麻烦的。难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一定拉得出粪来？看守关闸是日本兵，不是葡兵。那些日本人很凶恶，‘虾虾霸霸’^①，我们都挨过。我记得我们整群人都要‘督’^②一些粪出来给他们检验。老实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但是在他们的淫威底下，是不能不做的。他规定你要这样做就一定要这样做。小朋友都不能豁免，我当时大概九岁。”儿时的战争记忆，特别是屈辱的记忆，伴随着那一代人的一生。

（八）社会生活

很多难民从内地逃难来澳，对澳门狭小的生活居所和多元化的族群结构，要经历一个长时间的适应过程。陈既平说：“在广州住的房屋很大，来到澳门便要租别人的一厅一房，本来是两房的，但业主要自己住一间房，幸好我们人数不是太多，只有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四个人。我们不习惯有太多外国人，但那时葡人、印度人、黑人，随街都是，黑人不会让他们经常出来的，不过如果一出来，

① “虾虾霸霸”，即欺负他人。

② “督”，即挑。